

先秦寓言選

藍开祥 胡大浚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先秦寓言選

蓝开祥 胡大浚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刘炳森
责任编辑：盛永祜
封面设计：卜维勤
插图

先秦寓言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0,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10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1—30,000

书号 10019·3535

定价 1.00 元

前 言

—

寓言是一种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和悠久历史的文学形式。它通常是通过短小精悍而又富于风趣的动物故事或人物故事，采用象征、拟人等手法，寄寓一种思想、哲理或经验教训。优秀的寓言故事，往往在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发挥其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增长人们的智慧和才干。

在我国先秦文学中，寓言占有突出的地位。现存的一些古代典籍里，保留有大量的、丰富多采的先秦寓言故事。这些寓言，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无论从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哲理，所体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经验，以及其艺术表现方法，都有批判借鉴的价值。它是先秦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我们民族悠久的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与古代神话、《诗经》、《楚辞》联璧同辉。

先秦寓言，大量蕴藏在诸子著作和史书中；但寓言这一文学形式，实来源于民间，是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先

秦寓言经历了一个由民间口头流传到文人记录加工而形成书面文学的过程。

我们说寓言这一文学形式产生于民间，这从现存先秦寓言的内容即可以看出。先秦寓言中，有很大数量是反映各种劳动生活经验的；有一部分记录了社会下层生活的佚闻和趣事；还有一些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鲜明的爱憎感情；从这些看来，都是来源于有劳动实践的下层人民。另外，在诸子著作和史书中，记录了许多内容相同或近似的寓言故事，有的寓言在几部书中重复出现，有的在同一书中前后互见。这又是这些寓言来源于民间的绝好说明。

寓言既来源于民间，那么，这种文学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

寓言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是通过简单的故事以寄意，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直接说明某种生活事理。因此，优秀的寓言，故事简短而精粹，寓意鲜明而深刻。这一文学形式，是适应着古人总结交流社会生活经验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早的寓言，本身就是古代人民生活经验的形象的记录。

从纯粹实际的功利的目的出发，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人类童年时代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普列汉诺夫认为：“从有用的观点对待事物（当然也对待行为）的态度，是先于从审美快感的观点对待事物的态度的。”（《没有地址的信》）这是一个关于文学艺术起源和原始文艺的特质的唯物主义的正确答案。不但原始时代的绘

画、雕刻、舞蹈、诗歌，都首先是基于“有用”的观点而产生，原始神话也是原始人基于“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要使“神”为自己谋福利的实际目的、功利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

原始人因其生产力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自己无法解释的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归因于超自然力——神的支配，这就是神的观念从而也是神话产生的根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的眼光，逐渐由神转向人，由自然转向社会。正是随着人们社会生活领域的开拓，人们社会生活联系的日趋广泛，为了总结交流社会生活经验，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便应运而生。于是，在讲述神的故事的神话之后，又出现了讲述人的故事的寓言（寓言中的动物或无生物故事，也都是人格化了的）。

由神话到寓言，由讲述神的故事到讲述人的故事，乃是人类认识能力跨上一个新的梯阶的生动体现。如果说，神话是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所结出的艺术之果，那么可以说，寓言是人类由童年的蒙昧向文明时代迈进过程中，继神话之后创作出来的艺术珍品。

我国的先秦寓言，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到战国以前的漫长的奴隶制时代，是继原始神话之后出现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只是由于古代没有系统地记载它们的专书，不论是神话或是寓言，我们今天都只能从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典籍中窥见其大概，而难以确知其全貌了。

自原始公社解体至春秋战国的长时期中，有大量民间

传说和寓言故事在先民口头流传着，这是毫无疑义的。

《论语·子张》载有子夏的一段话，认为来自民间的“小说”之类，“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虽则认为它们可以作为“观民风”的参考，但属于小能小善，对大道有碍，是被鄙薄的东西（《汉书》引用这段话径作孔子语）。到了汉代，《汉书·艺文志》仍著录有“小说十五家”，班固说它们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亦刍蕘狂夫之议也”。可知，内容主要是记录人民口头创作的东西。这十五家中，多数记述秦以前之事，它们记述了从原始公社解体时代的黄帝、尧、舜，以及殷、周、春秋战国的种种民间传说。

《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所谓稗官，据如淳讲，是古代采集民间风俗、记录民间传说以供帝王了解情况参考的一种人。他们对“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从而使许多民间的创作被记录了下来。可惜这些东西今天都亡佚了。然而，这种记录民间创作的方法，影响所及，到战国诸子百家中，就专有小说一家；其它各家，也从自己写作、论辩的需要出发，注意从民间创作中录取素材，汲取养料。庄子讲大鹏与小雀的故事（《逍遥游》），自称是引述《齐谐》的话，意在表明自己所说不虚。看来《齐谐》就是记录民间传说的书，可见庄子是很重视神话故事一类民间创作的。《韩非子》的《说林》、《内、外储说》诸篇，更是辑录各种故事传说的专章，其中便包含了大量优秀的寓言。

战国时代书面寓言大量出现，这与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百家争鸣生动局面的出现密切相关。

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是一个由列国兼并走向封建大一统的社会大变动时代。这个时代，造就出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士”阶层，他们提出了种种政治学说，设计了各种社会蓝图，通过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互相论难，游说人主，力求推行自己的主张。在游说论辩中，既要能以理驳倒论敌，又要能做到言辞晓畅，使人乐于听取，易于理解，博得人主的信任采纳；这就要求大力提高语言修辞的技巧，尽可能把道理深入浅出地说得娓娓动听、透彻精辟。因此，用生动的故事寄寓抽象事理的寓言——这种早已流行于民间的文学形式，自然为士人们所采纳和运用。用之不足，则仿之而自行创作。于是，运用和创作寓言逐渐形成风气。我们从现存战国诸子著作和《战国策》记述谋臣策士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发展情况。其中道家的庄子 and 法家的韩非，可以说是运用寓言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专家。他们的文章，或采取生动的民间寓言故事以发明事理，或借历史事件以阐述教训，或根据说理需要自己创作寓言；有的将寓言巧妙穿插在论说中，有的先提出一个论纲，然后用连珠体的寓言故事层层阐析，有的干脆就是寓言故事的汇编。这样就使得本来抽象的哲理文字写得生动具体，大大增强了说服力。

战国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故事，大体有三个

来源：

第一、在民间传说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

《大鹏与小雀》这则寓言出自《齐谐》，《任公子钓鱼》这个故事，也是从所谓“轻才讽说之徒”即讲故事的民间艺人那里听来，这都是《庄子》书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先秦寓言中，象为人们所熟悉的《狐假虎威》、《鹬蚌相争》、《三虱食毳》、《埴井之蛙》等动物故事，以及《次非刺蛟》、《杞人忧天》、《詹何钓鱼》等神话色彩浓厚的寓言故事，都可能脱胎于民间传说；《守株待兔》、《郑人买履》、《卜妻为袴》、《攫金者》、《亡鈇》等一类寓言，三言数语，质朴无华，以农村或市井日常生活的某种现象，寄托一定事理，则仍然清楚地保留着民间口头文学的特点；而《愚公移山》、《揠苗助长》、《虞庆为屋》、《画鬼最易》等等，或总结了生产实践的经验教训，或歌颂了劳动者的智慧和才干，或嘲讽了脱离实践的“智”者，大体上也是以民间传说为蓝本而创作出来的。

战国思想家和作家们在民间寓言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是我国先秦寓言文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和提高，使寓言这一文学形式更加成熟。这里不仅是艺术上的提高，也包括思想上的深化。《狙公养狙》这则寓言，《庄子·齐物论》所载，十分简略，可能是这则寓言的原始形态。但在后出的《列子·黄帝》中，便加工成一个更生动的故事。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作家从艺术上对民间寓言故事加工提高的迹象。《守株待兔》这则寓言，原意可能是讽刺那些坐等时

机，不愿从事艰苦劳作的懒汉。《韩非子》书中用它来批判泥古守旧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深化了寓言的思想意义。

《吕氏春秋》用《刻舟求剑》说明治国从政必须因时而异的道理，也体现了对民间寓言思想上的升华。《庄子》书中的多数寓言，那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鲜明的形象，优美的文辞，更是作家对民间寓言故事加工提高的成果。

战国诸子对民间寓言故事的收集、加工和改造，不仅使大量民间寓言得以保留下来，而且使之从艺术上和思想上得到提高，这是他们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但是战国诸子按自己的需要对民间寓言故事进行改造，也往往有改变民间寓言的原貌，歪曲了它的思想的情况。比如《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本来讲的是劳动实践的经验，但经过庄子之手，却把它变成讲“养生之道”的东西，鼓吹回避一切矛盾斗争的消极思想，显然歪曲了原意。又如《揠苗助长》这则寓言，本来是嘲笑那些违背作物生长规律、急躁蛮干的人的，然而孟子却拿它来宣扬自己的唯心主义的“养气”学说，说明要得到所谓“浩然之气”，必须通过内心的长期修养，不能速成的道理；寓言的原意与孟子的思想，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们在阅读研究先秦寓言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一番去芜存菁的鉴别整理。由于诸子多半只从自己创作的需要采录民间寓言，所以，没有采录的不少民间寓言多亡佚了。

第二、是渊源于历史故事，经诸子的加工改造，从而转化成为寓言。

春秋战国时代激烈的政治斗争，社会生活急剧的变化，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人们认真总结，深刻记取。众多的历史故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在各阶层的人们中流传。其中一部分历史故事，因其本身就有劝诫意义，所以在诸子的哲理散文中，在游说之士的言辞中，往往征引它来阐明事理，这样就赋予了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以某种普遍的意义。这样的一部分历史故事，实际上也转化成了寓言故事，其中的历史人物也就应当作为寓言人物看。如《唇亡齿寒》这则寓言，其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年及五年》，是有历史依据的。但《韩非子·十过》及《吕氏春秋·审大览·权勋》引用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顾小利则大利之残”的道理，《韩非子·喻老》同样引用这个故事，却又寄寓了凡事要有先见之明，要“争于小”、“早从事”的道理。这就具有了寓言的性质。又如《释车下走》这则寓言，在《晏子春秋》中简略而平淡，到了《韩非子》书中，把平淡的记叙变成细致的描述，对比之下，不但可以看出后者在艺术上的提高，也可看出由历史故事向寓言故事演化的辙迹。其它如《紂为象箸》、《子罕不受玉》、《惠施之谋》、《魏王索郑》、《邹忌照镜》、《简子放生》等等故事，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经过加工改造，不失为优秀的寓言作品。因此，我们认为，由历史故事演化为寓言故事，这是先秦寓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也反映了战国时代社会政治斗争对于寓言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是诸子自己创作的寓言。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寓言》）。这也就是鲁迅先生在论及庄子时所指出的：“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汉文学史纲要》）所谓“藉外论之”，就是假借空言无事实的寓言故事，以阐释自己的哲学、政治观点。《庄子》书中的寓言故事，便有相当一部分是庄子（包括他的后学）的创造。它们既受有民间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的启示和影响，但在内容题材上又无所依傍，往往匠心独运，造诣甚高。比如《庄周贷粟》、《惠子相梁》和《曹商使秦》这几则寓言，写了庄子的所遇所见，很显然是庄子自己面对现实问题有感而作的。《儵忽与浑沌》这则寓言，儵和忽，都是轻率的意思，犹如今天说“马大哈”，而所谓浑沌，本指天地未开，浑然一体，这里指浑沌的七窍不具，庄子在这里立名寓意，鲜明体现了寓言的主旨，说明轻率从事，任意穿凿的危害，同时也包含着彻底无为、随顺自然的消极思想。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庄子在古代神话启示下虚拟出来的。在《庄子》书中，许多寓言人物，如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前人已指出，是庄子自己塑造的，这些寓言，当为庄子自己的创作。在运用寓言以说理成为一代之风的战国，其他诸子自己创作寓言，当也不在少数，不过今天难以一一区分出来罢了。

以上事实说明，战国时代书面寓言文学的繁荣，既是根源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也是寓言这一文学形式历史发

展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战国时代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就不会有寓言文学的空前繁荣；没有历代劳动人民辛勤耕耘过的民间寓言的肥沃土壤，也就不会有战国寓言文学的高度成就。

二

先秦寓言既然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经过士阶层的收集记录与再创作而保留下来，必然深深打下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内容比较复杂。其中包含了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而且往往杂糅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按照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原则，对先秦古籍收藏的大量寓言故事，切切实实地进行一番整理工作。

比如，《庄子》书中的寓言，都是用来说明庄子一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的，而庄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却由于他们不能理解当时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有时对社会的丑恶现象充满了愤激之辞，辛辣、俏皮、尖刻地进行了批判，但最终是以泯灭是非、超然物外、消极厌世为其归宿的。然而庄子通过众多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大小、内外、有无、是非、真伪、同异等等众多的矛盾，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的因素，则是可以汲取的。别的诸子书中的寓言，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要通过批判，把其中蕴藏着的合理的成分提取出来，有取有舍，不能不加区别地兼收并蓄。

然而，现存先秦寓言中，思想性、艺术性均好或较好的，毕竟占有相当大的数量。这部分寓言就其思想内容及所提供的客观意义，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关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代，是各种哲学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加深，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寓言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成就。如《晏子春秋》中的《大鹏鸟与小焦冥》，展示出了宇宙的广阔场面，也反映出古代人民试图揭开大自然奥秘的精神。《循表涉澮》、《刻舟求剑》（均载《吕氏春秋》）等寓言，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说明社会发展的观点。而《孟子》中的《揠苗助长》，《庄子》中的《庖丁解牛》、《鲁侯养鸟》、《东野稷之御》等，则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注意掌握其特定的规律，按其固有规律办事。其它如《战国策》中的《惊弓之鸟》，说明事物的表象与其本质存在着必然联系。《列子》中的《杨布打狗》，说明被偶然现象所迷惑而发生错觉，是可能的。《战国策》中的《卖朴与买璞》，提出了循名责实、注意名实相一致的问题。这些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涉及到认识论上多方面的问題。

有一些寓言，还体现了事物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一些道理，反映了辩证逻辑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如《韩非子》中的《三虱食鹘》、《自相矛盾》等。《棘刺母猴》（《韩非

子》)这则寓言,说明对于某种没有条件直接验证的东西,可以根据此事物与彼事物存在的必然联系,用推理的方法间接予以证明。而《吕氏春秋》中的《偏枯之药》,则是从事物各有其固有矛盾出发,揭露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论的谬误,说明在不同质的事物之间不能类推的道理。

先秦寓言中,还有一部分直接批判了唯心思想和鬼神观念。如《庄子》中的《桓公见鬼》,《荀子》中的《涓蜀梁》,《韩非子》中的《齐王见河伯》、《画鬼最易》等,否定了鬼神的存在。《列子》中的《鲍氏之子》,批驳天有意志的唯心说法。此外,《墨子》中的《上帝杀龙》,揭穿了占卜者的虚妄。《染丝》强调了客观环境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吕氏春秋》中的《宋王与使者》、《毁钟掩耳》、《亡铁》,则是对各种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嘲讽。这些寓言,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精神依赖于物质、认识产生于实践的正确观点。

第二类、关于阶级斗争、对剥削阶级的揭露和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兼并以及阶级斗争状况和它的经验教训,在寓言中也得到一定的反映。这里有对列国兼并的教训的总结的,如《唇亡齿寒》和《魏王索郑》(均《韩非子》);有对兼并战争的批判的,如《蜗角之战》(《庄子》);有对剥削者的吸血本性的揭露的,如《竭池求珠》(《吕氏春秋》)、《庄周贷粟》(《庄子》)等等。特别是对于剥削制度肌体上滋生出来的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先秦

寓言中更有着淋漓尽致的揭发和批判。《尹文子》中的《田父得玉》，鞭挞了用欺诈手段损人利己以获取财富的人。

《墦间乞食》（《孟子》）和《曹商使秦》（《庄子》）刻画了用卑鄙手段猎取功名利禄者的丑态。《儒以诗礼发冢》（《庄子》）揭露了剥削阶级道德的欺骗性和在这种道德熏陶下产生的两面人、伪善者。还有《吕氏春秋》中那个只见金子不见人的“攫金者”（《攫金者》）和《韩非子》中靠招摇撞骗混来好日子的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列子》中那个拾得一片“遗契”，便白日做起发家美梦的宋人（《藏契者》）和《韩非子》中耍弄权谋而得到益处的鸱夷子皮（《涸泽之蛇》），统统是那种私有制度下所产生出来的病态的人。寓言对他们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进步观念。

第三类、关于生产斗争的经验和学习的经验

这是先秦寓言中直到今天仍很有借鉴意义的部分。《愚公移山》（《列子》），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闪耀着“人定胜天”思想光辉的寓言。它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和富有智慧的人民；其意义又远不限于生产斗争。直到今天，愚公移山的精神仍在鼓舞着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艰苦奋斗。其它如《墨子》中的《公输子为鹄》，提出了劳动应该讲求功利的问题。《庄子》中的《轮扁斲轮》，强调了自身长期的实践对于掌握技能的重要性。《虞庆为屋》（《韩非子》）批判了毫无实践经验却冒充内行、胡乱指挥的人物。这一类寓

言，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经历了许多成功与失败，才得以总结出来的道理。

如何搞好学习，攻克技术难关，寓言从学弈、学琴、学讴、学射、学御等多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同样可资借鉴。《孟子》中的《学弈》和《庄子》中的《庖丁解牛》，都是讲的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用志不分的道理。《列子》中的《师文学琴》、《纪昌学射》，说明学习上要有精深的造诣，必须经过长期的苦心的摸索和锻炼。

《薛谭学讴》则告诫人们要真正学好一门技术，绝不可自满，半途而废。《造父学御》告诉人们学习技术，关键在于体会、掌握其内在规律性的东西。《列子问射》（《吕氏春秋》）教人成功一件事情之后，还要弄清为什么能成功的道理。《邯郸学步》（《庄子》）则从反面教育人不能抛开自己的所能盲目地模仿别人。这些经验都是古代人民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符合于人类认识的规律的。

第四类、关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教训

先秦寓言，还从多方面总结了日常生活的经验教训，这里只提几点说一说。如《战国策》中的《南辕北辙》，说明做任何事情都要方向对头。《韩非子》中的《买椟还珠》，说明办事要分清主次，主次颠倒，就达不到预期目的。《庄子》中的《运斤成风》，说明办事要注意和当事人很好配合。《韩非子》中的《扁鹊见蔡桓公》，告诉人们要善于看清事物出现的苗头和发展趋势，及早解决问题。这些，都是至今仍能启人睿智的好作品。